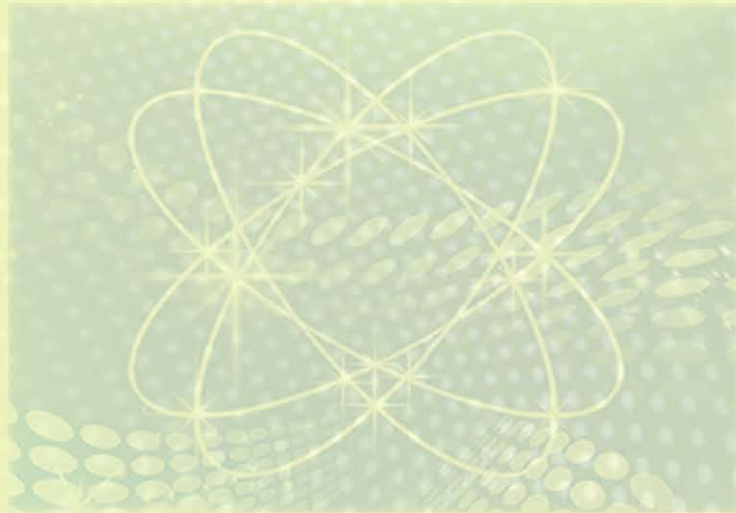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下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全3册 / 王文光、朱映占、
赵永忠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404-4

I. ①中… II. ①王… ②朱… ③赵… III. ①少数民族—
民族历史—西南地区 IV. ①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5049号

出品人:周永坤

责任编辑:赵红梅

特约编辑:李兴和

责任校对:何传玉

严永欢

装帧设计:刘雨

责任印制:张爱成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

ZHONGGUO XINAN MINZU TONGSHI

(下册)

王文光 朱映占 赵永忠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总印张:94

总字数:1830千

版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82-2404-4

总定价:190.00元(全三册)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650091

电话:(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目 录

第八章 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	(1)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	(1)
一、国民政府治理西南的背景	(1)
二、国民政府及相关政党、学术团体治理西南的思想	(3)
三、国民政府对西南的治理目标与政策	(9)
四、国民政府对西南的政区设置	(13)
(一) 四川省的政区设置	(13)
(二) 西康省的建立与政区设置	(18)
(三) 云南省的政区设置	(22)
(四) 贵州省的政区设置	(33)
(五)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治边机构设置	(41)
五、国民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建设	(43)
(一) 经济建设	(43)
(二) 国民教育	(47)
(三) 民政建设	(53)
(四) 宗教管理	(60)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	(61)
一、民国时期对西南民族的认识与研究	(62)
二、民国时期四川省的民族	(65)
(一) 民国时期四川的罗罗	(66)
(二) 民国时期四川的番族	(72)
(三) 民国时期四川的羌民	(77)
(四) 民国时期四川的苗人	(81)
(五) 民国时期四川的么些	(83)
(六) 民国时期四川的土家	(84)

三、民国时期西康省的民族	(84)
(一) 民国时期西康的番族	(85)
(二) 民国时期西康的罗罗	(98)
(三) 民国时期西康的羌人	(103)
(四) 民国时期西康的其他民族	(103)
四、民国时期云南省的民族	(104)
(一) 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概述	(104)
(二) 民国时期云南的罗罗	(105)
(三) 民国时期云南的窝泥	(126)
(四) 民国时期云南的傜傜	(132)
(五) 民国时期云南的傜黑	(138)
(六) 民国时期云南的古宗	(141)
(七) 民国时期云南的西番	(142)
(八) 民国时期云南的么些	(143)
(九) 民国时期云南的怒人	(145)
(十) 民国时期云南的倮人	(146)
(十一) 民国时期云南的阿昌	(147)
(十二) 民国时期云南的山头	(149)
(十三) 民国时期云南的民家	(152)
(十四) 民国时期云南的摆夷	(157)
(十五) 民国时期云南的苗人	(167)
(十六) 民国时期云南的瑶人	(178)
(十七) 民国时期云南的僮僚	(181)
(十八) 民国时期云南的仲家	(185)
(十九) 民国时期云南的卡佤	(186)
(二十) 民国时期云南的崩龙	(189)
(二十一) 民国时期云南的蒲满	(190)
(二十二) 民国时期云南的回族	(193)
(二十三) 民国时期云南的其他民族	(200)
五、民国时期贵州省的民族	(202)
(一) 民国时期贵州的苗人	(204)
(二) 民国时期贵州的仲家	(214)

(三) 民国时期贵州的侗家	(219)
(四) 民国时期贵州的仡佬	(221)
(五) 民国时期贵州的木佬	(225)
(六) 民国时期贵州的水家	(226)
(七) 民国时期贵州的佯黄	(228)
(八) 民国时期贵州的僮家	(228)
(九) 民国时期贵州的瑶人	(229)
(十) 民国时期贵州的罗罗	(230)
(十一) 民国时期贵州的土家	(233)
六、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	(234)
(一) 经济发展状况	(234)
(二) 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变迁	(236)
(三) 文化教育	(239)
第三节 民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关系	(241)
一、民国时期的西南与内地	(241)
(一) 国人对西南民族的认知	(241)
(二) 西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247)
(三) 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及其对政府民族政策的反应	(249)
二、民国时期西南各省之间的关系	(255)
(一) 川藏、滇藏关系	(255)
(二) 川康关系	(257)
(三) 川滇黔关系	(258)
三、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259)
(一) 西南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259)
(二) 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261)
四、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271)
(一) 政治关系	(271)
(二) 经济关系	(272)
(三) 社会文化关系	(273)
五、外国因素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276)
(一) 侵略与抵抗对国内民族关系的影响	(277)
(二) 基督教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277)

(三) 外国人的相关活动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284)
第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西南民族	(287)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对西南的治理及政区设置	(287)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	(287)
二、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	(289)
(一) 云南的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	(289)
(二) 贵州的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	(292)
(三) 四川的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	(293)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西南的政区设置与调整	(295)
(一) 西南的政区设置	(295)
(二) 西南的政区调整	(299)
第二节 中央民族访问团、少数民族参观团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300)
一、中央民族访问团对西南民族的访问	(300)
(一) 中央民族访问团对云南民族地区的访问	(301)
(二) 中央民族访问团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访问	(304)
二、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和内地参观访问	(305)
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306)
(一)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307)
(二) 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310)
(三) 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312)
第三节 西南的民族识别与西南现代各民族的形成	(313)
一、西南民族分布的基本特点	(313)
(一) 现代西南藏缅语族各民族分布特点	(313)
(二) 现代西南壮侗语族各民族分布特点	(315)
(三) 现代西南苗瑶语族苗族、瑶族分布特点	(317)
二、西南的民族识别	(318)
(一) 民族识别调查	(318)
(二) 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	(320)
(三) 民族识别经历的几个阶段	(323)
(四) 对西南民族识别的反思	(334)

三、四川省（含重庆市）的民族	(336)
(一) 四川的彝族	(337)
(二) 四川的藏族	(338)
(三) 四川的羌族	(340)
(四) 重庆的土家族	(341)
(五) 重庆的苗族	(341)
(六) 四川的傈僳族	(342)
(七) 四川的布依族	(343)
(八) 四川的蒙古族	(343)
(九) 四川的壮族	(344)
(十) 四川的白族	(345)
(十一) 四川的回族	(345)
(十二) 四川的纳西族	(346)
(十三) 四川的满族	(346)
(十四) 四川的傣族	(347)
四、云南省的民族	(348)
(一) 云南的彝族	(348)
(二) 云南的白族	(353)
(三) 云南的藏族	(354)
(四) 云南的哈尼族	(356)
(五) 云南的纳西族	(359)
(六) 云南的傈僳族	(360)
(七) 云南的阿昌族	(362)
(八) 云南的基诺族	(363)
(九) 云南的怒族	(365)
(十) 云南的独龙族	(366)
(十一) 云南的景颇族	(368)
(十二) 云南的普米族	(370)
(十三) 云南的拉祜族	(371)
(十四) 云南的壮族	(372)
(十五) 云南的布依族	(374)
(十六) 云南的水族	(375)

(十七) 云南的傣族	(376)
(十八) 云南的布朗族	(377)
(十九) 云南的德昂族	(380)
(二十) 云南的佤族	(381)
(二十一) 云南的苗族	(382)
(二十二) 云南的瑶族	(382)
(二十三) 云南的满族	(385)
(二十四) 云南的蒙古族	(386)
(二十五) 云南的回族	(388)
五、贵州省的民族	(389)
(一) 贵州的苗族	(389)
(二) 贵州的布依族	(390)
(三) 贵州的侗族	(391)
(四) 贵州的土家族	(391)
(五) 贵州的彝族	(392)
(六) 贵州的仡佬族	(393)
(七) 贵州的水族	(394)
(八) 贵州的回族	(395)
(九) 贵州的白族	(397)
(十) 贵州的瑶族	(398)
(十一) 贵州的壮族	(398)
(十二) 贵州的畲族	(399)
(十三) 贵州的毛南族	(399)
(十四) 贵州的蒙古族	(400)
(十五) 贵州的仡佬族	(401)
(十六) 贵州的满族	(402)
(十七) 贵州的羌族	(402)
六、西南各民族的文化	(403)
(一) 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文化	(403)
(二) 壮侗语族各民族的文化	(408)
(三) 苗瑶语族苗族、瑶族、畲族的文化	(410)
(四) 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的文化	(413)

(五) 当代西南民族的非物质文化与文化保护	(420)
(六) 当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与类型	(424)
第四节 中国西南当代的民族关系	(427)
一、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建立	(427)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变化	(427)
(二) 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	(429)
(三)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432)
(四)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破坏	(441)
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的西南民族关系	(445)
(一) 西南民族工作中的拨乱反正	(445)
(二) 日益巩固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47)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南民族关系	(452)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大事年表	(455)
后 记	(533)

第八章 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

民国创立之后，如何实现多民族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如何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依然是当政者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清末以来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同时其政治结构多元化特点突出，因此，如何促发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国民意识与国家认同，进而对西南多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不仅是执政者的当务之急，也是其所面临的棘手难题。^①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

一、国民政府治理西南的背景

民国建立后，名义上承袭了清王朝的疆域，而就中国疆域的西南地区而言，在民国之前，清朝政府早已建立了四川、云南、贵州等几个省级行政单位，并且到清末逐步在西南民族地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与此同时，自清末以降，中国西南屡受英、法等国的染指，外国传教士、探险家、科考队纷至沓来，甚至英、法等国的武装力量也不时侵入中国西南地区，西南边疆出现了危机，从而加剧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问题的复杂性。

西南边疆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殖民企图和殖民活动使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被帝国主义殖民和分裂的危险；二是在复杂的局势中西南边疆民族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交织。

对于殖民危机而言，早在18世纪30年代，法国天主教教会势力已经进入云南，此后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循道会”“安息会”等教会组织也纷纷进入西南地区传教。与此同时，英、法等国还派出考察人员或组织考察队，对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线和西南地区的各种资源情况进行探视、收集；更有甚者，如英国军队还擅自入侵江心

^① 朱映占、段红云：《民国治边事业中的边政人员考察》，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坡、班洪、班老等地。在此过程中，外国人的传教行为不免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产生冲突，而其考察活动更引起当地民众的警觉，其军事侵略行径更是遭到了边疆人民的坚决抵抗。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仅在西南地区的云南就先后发生了“马嘉理事件”（1874年）、“江心坡事件”（1891年）、“片马事件”（1911年）、“班洪事件”（1933年）等。另外，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地一些土司、土官、土民由于缺乏国防观念和民族意识，在日军的唆使、纵恿下，不断出现民心外向的危情”。^①由此也可以看出，自清末以来的英、法等外国势力向中国西南侵入、渗透等活动并没有因民国的建立而减退，加之日本的入侵使得西南边疆危机更加严重。因此，中华民国要想从名义上完整统一的国家变成为实质上完全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其疆域之内的西南边疆危机就必须在抵御外辱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此为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背景之一。

而要解决边疆危机问题，除了对外交涉，还必须借助于居住在西南的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让他们成为爱国、守疆固土的国民。当然，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由传统的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一个国家游移的边陲将由明确的边界所取代。

西南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直到近代以来，除中央王朝在此建立的土司制度之外，其内部各个民族还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如西双版纳傣族、黔西彝族的领主制度以及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景颇族的山官制度、基诺族的长老制度、摩梭人的母系制度等，而且一些民族之间还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民国的建立，即是宣告传统的“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的结束，然而真正做到让处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民族群体统一到现代民族国家中来，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进行改革或废除，并且在进行制度变革的同时，需要塑造西南各民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这就要求政府在对外力求消除外部势力侵略的同时，还必须从内部多个方面和层面开展西南边疆的建设工作。

民国建立后，西南边疆的建设自是民国政府的分内之事，然而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西南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南边疆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中央政府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西南边疆建设的关键因素。

民国初期的西南，特别是云南作为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先驱，是缔造共和的重要区域，之后军阀混战使得西南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直到1934年之前，中央政

^① 张文芝：《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载《云南档案》2005年第3期。

府对西南的影响力有限，西南各省形成了地方派系实力集团，如在四川、西康有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在云南有唐继尧，尔后又有龙云、卢汉等，在贵州有刘显世、王家烈等。^①而在此一时段，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为巩固自己的实力，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了政治、经济、教育、民政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活动。例如，龙云在云南积极推进建设“新云南”的各种措施。

抗战爆发后，西南成为大后方和抗战基地，此一时段中央政府携军事、经济、教育等进入西南，逐步加强了对西南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国人对西南的了解和认识。“为使西南各省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使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对抗战后方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国民政府还提出‘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的口号，动员开发民族地区，以确保后方安全，并利用民族地区资源支援抗战。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边疆行政机构（如成立西康省），使其‘对于边政不但有管辖之权，且负责推行的责任’。”^②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欲再以西南为基地，然而西南地方实力集团的存在，加上全国形势的变化，使得国民政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而这却客观上使得西南免受了许多直接的战乱之苦。当然，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活动也因战时迁来的企业、工厂和各种机构的撤离，加上全国内战局势的影响，而逐渐停滞乃至减退。

二、国民政府及相关政党、学术团体治理西南的思想

民国时期，执政党、在野党，以及知识界都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方面发表了看法，形成了一些思想言论，成为此时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思想基础。

民国时期关于民族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无疑首推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事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辛亥以前偏重反满，到民初有五族共和的主张，到十三年中山先生演讲时，具体内容包含：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积弱扶贫，协助弱小民族的平等和独立。对内，实行民族同化、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进而组织自由统一

^①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② 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7~48页。

的中华民国”。^① 王柯在研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时，也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由辛亥革命前的‘排满’变为民国建立后的‘五族共和’，再进一步变成了‘民族同化’”，^② 其实质是从建设一个由汉族自己组成的“中华民族国家”，转变为建设一个包括中国国内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国家”。^③ 在其思想转变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即必须按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式建设一个近代的“中华民族国家”，也就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族”思想是始终一致的。^④

汪精卫则在其写的《民族的国民》一书中表达了建立单一种族群体组成的国家的优越性，第一是同为一种族群体则国民之间的兄弟之情促使更容易出现平等；第二是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罅隙，没有一族压制束缚另一族的争斗，因而国民更自由。^⑤

蒋介石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为反清，五四运动之后则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⑥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渐趋成形，此时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少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甚多，宗族的组织，更斑斑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纪录。此共同之纪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⑦

总体而言，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汪精卫、蒋介石，其民族思想在不同阶段虽有所

①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59年。

②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③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④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⑤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⑥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7页。

⑦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印行，1984年。

差异，但最终都落脚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上。^①

清末民国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各地纷纷组建政党，至民国初，中国政治性团体即达 300 多个。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党在各自提出的政治主张中，多少都涉及了民族政策方面的内容，如在学者调查的 35 个政党中，有 9 个主张种族同化。^②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不断探索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由于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有所不同的“民族平等”原则，在承认国内各个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平等，表达了各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的主张。并且在其主张中涉及各个民族时，强调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中华民族则强调的是领土和疆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承认各民族的具体存在，反对民族“取消论”或“民族同化论”。^③当然，从中国共产党组建到 1949 年，其民族思想与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相呼应，且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④

在民族与国家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和当时苏联政策的影响，以及为了削弱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一再强调了“民族自决”原则，主张各个民族都有建立本民族政权和国家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并且，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地区时，依据民族自决原则，还支持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了政府。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独立意识上的民族自决，实际上只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此，1937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放弃了“民族自决论”和“联邦制”的主张，^⑤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解决中国境内的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

在民族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民族平等的原则，都在努力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这是不争的事实”。^⑥早在 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在中共中央给西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

① 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②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9），1985 年，第 38 页。

③ 王柯：《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0 年第 60 期。

④ 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⑤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7 页。

⑥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7 页。

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并且在红军长征过西南的途中，民族平等原则也得到了认真履行，这给西南少数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红四方面军在到达北川后，就在当地宣布，“不论各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称呼羌族为“蛮子”等。^①而松潘羌族土司安登榜就是看到红军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和对群众秋毫不犯，深受感动，毅然参加了红军。^②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论联合政府》不仅批判了国民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蒋介石否定各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宗族说”，而且还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自治权利”。

在民族发展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同化，主张在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文化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赋予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例如，1932年中共四川省委提出：“党应当设法首先在宁属、西康、松理茂团结夷民中的先进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给以教育和训练，培养出夷民群众的革命干部创造共产党的基础。”^③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得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可，成为他们此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依据之一。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政党和团体阐述了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统一党的主张。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织而成。在其政治纲领十一条中，第三条主张：“融合民族，统一文化。”

统一共和党，由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等人组织而成，后来并入国民党。在其政治纲领十二条中的第十一条主张：“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

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张。在该会十二条信约的第一条中称：“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④1941年，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及少数无党派人

① 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② 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④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士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9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部分的第八点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国家应扶持助其成立自治机构及文化之发展。”^①

中华民族社会党的主张。1944年，中华民族社会党在其《宣言》中指出：“祖国、民族乃整个一不可分者也。回顾我中华民族，有令人不堪浩叹者。今日之中华民族不仅一国三分，实为四分五裂，遂致社会日乱，国事日非，终至民难以为民，国不成其国，此何故耶？曰无一纯正之思想、主义以指导之、统帅之也。”^②故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指导原理”的新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联治民主党的主张。1947年，由边疆民族人士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联治民主党在北平成立。该党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度。在其成立宣言中称：“中国的历史是我们各民族的历史，中国的土地是我们各民族的土地，中国的主权是我们各民族的主权，中国的安危关系我们各民族的存亡，中国救治是我们各民族的责任。”并且，在其政治纲领中主张：“一、汉满蒙回藏苗夷各民族为组成国家之主体，应绝对平等，以彻底改正一姓、一家、一族、一党专政、中央集权、汉族主体、内地本位之大汉族主义的历史传统错误，从目下起，结束国内四五十年来各民族间为政权斗争之互相推翻的循环政潮。二、用联邦制度，解决民族间的政治问题；用民主制度，解决人民与政府间的政治问题；用分权的集权制度，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争权问题……”^③

概括而言，不同政治派别在民族问题上，大都主张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融合、建设国族（即中华民族）等。无疑，这些主张是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思想背景。

随着近代知识群体的形成，一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民族、国家方面，发表了诸多言论。然而，由于其所处时代，中国的命运及受世界思潮的影响，促使他们大多都接受了进化论思潮，并且他们把进化论改造成适合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在此思想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撰写了中国疆域内各个民族从上古、古代到近代的进化发展的线性历史，并且往往把国家史与民族史联系起来。可以说知识群体的观念和思想印证了政治群体行为的合法性，并且两者往往一起形成合力来塑造中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1页。

③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669页。

国的近现代民族国家。^①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在实地调查中，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碧笙在云南边地调查时提出了“治边的三个基本认识”：首先，要认识边地民族的不统一性。因此，治理边地不能只专注某一个民族的利益，而是要兼顾各个民族的利益。其次，要认识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对立性。因此，治理边地不能只看到土司的利益而看不到平民的利益，或把土司的利益当作平民的利益。最后，要认识到土司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性。因此，边官要依此而推进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对土司之间的明争暗斗推波助澜，从中渔利。^②

李安宅在总结以往的边疆治理方法后指出：“过去对于边疆只有军事与外交的方式，即所谓政治，也限于管与教，而未顾及养与卫；更不用说，即管也未彻底，而教只在形式了。彻底的管，实际的教，当与养打成一片，那就是积极的福利设施。”^③

而在四川考察的于式玉也指出：“就四川而言，就应在灌县这样的地方，设立一个边民招待所。以招待所为据点，可以推动一切教育工作，如电影、教育、文物展览之类；政府的一切施政方针，也都可在那里宣传。边民既已得到实惠，又有各种文物展览，启发其比较向上的心理，则回到本地后，再由他们亲口向同族的人传播，自可收效更宏。如此，便可引起边民到灌县来观光的兴趣。来往赅续，内地文化不断地向他们灌注，他们的困难不断地使我们有所了解，其影响所及，一定比一年一次的服务团更有价值。有了这样的初步接触，再去深入边地进行第二步的正规工作，自可迎刃而解。”^④

江应樑主持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工作期间编写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着重论述了革新边疆行政的基本要点，他认为：首先，应整顿吏治，建立政府威信；其次，应改变“边民愚顽，非以威镇之不足以制服”的片面看法，主张“应以开化政策，代替高压政策”，通过提高边民的文化水准，改进生活方式，保存固有美德，统一语言文字，提倡夷汉通婚等措施开化民智。^⑤

① 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② 陈碧笙：《滇边散忆》，中国民俗学会1941年影印本，第35~37页。

③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载李安宅《〈礼仪〉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④ 于式玉：《记黑水旅行》，原载《旅行杂志》第十八卷第十期，转载于《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⑤ 林超民：《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载张波主编《丽江民族研究》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